第13卷第2期 杭州大学学报 Vol.13, No.2
1983年6月 JOURNAL OF HANGZHOU UNIVERSITY June 1983

# “甲之鼋”非“甲子朝”辨

周文康

《楚辞·九章·哀郢》“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鼋吾以行”句，叔师《章句》云：“甲，日也。鼋，旦也。屈原放出郢门，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洪补曰：“鼋、晁并读为朝暮之‘朝’。冯衍赋云：‘甲子之朝兮，汨我西征。’”两说并无分歧。以往治《骚》者，自朱子至郭老，均因王说，殆无疑义矣。《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载薛恭穆《〈楚辞〉解诂》云：“古人用干支纪日，甲之，即‘甲子’。之、子古字通。”为示不掠人之美，又把此项发明权归于洪庆善：“视洪氏此语，意在说明鼋字之词义，实际上却已将‘甲之鼋’即冯衍赋之‘甲子之朝’的消息传告给读者。”薛文认为：“冯衍赋此句内容与句式显然是模拟与糅合《九章·哀郢》这句‘甲之鼋吾以行’与《招魂》：‘汨吾南征’两个分句而成。所以‘甲子之朝’一语，正好可以作为此句的注脚。”又引《左传·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谓“其中‘丙之晨’与‘丙子旦’为互文，亦是其证。”故断言：“王逸之说不可信。”“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古汉语通论（十九）‘历法’部分，把此句（指《哀郢》句——引者）作为‘古人纪日有时只记天干不记地支’的例子”，也“似欠斟酌”。

之、子，中古音同为止摄、开口、三等，然前者为平声、之韵、章母，后者为上声、止韵、精母。上古或可相通。但作历法用语的十干十二支名，即使假借同音字（非近音），在古籍中也无实例。如“一”和“乙”，同为臻摄、开口、三等、入声、质韵、影母，常通假，唯纪岁、月、日互不相通。以“之”代“子”纪日，更未见过。薛文引《左传》为证，好在此非僻书，不过举手之劳耳。查僖公五年，《传》纪日甲子尚有“王正月（按：周正正月，《春秋》《左传》均用周正。）辛亥朔，日南至（冬至）。”“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醜奔京师。”《经》有“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日食）。”九月戊申朔而十二月丙子朔，九月、十一月为小月也。正月辛亥朔而九月戊申朔，则显为不合：如正月辛亥朔，当九月丁未朔；若九月戊申朔，当正月壬子朔。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周正正月，《隋书·律历志》为壬子朔，是月初三（甲寅）冬至；《汉书·律历志·世经》则与《左传》同：辛亥朔、冬至。据近人王韬《春秋历学三

种·春秋朔闰日至考》推算，《汉书》误，《隋书》不误。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的结论与王韬一致。因此有人认为《左传》这条为《春秋》所无的“日南至”记载，乃出自《世经》作者刘歆之手。① 但《春秋经》“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的记载，近现代中外学者用儒略积日推算验证，一致认为完全可靠。② 据九月（周正）小、戊申朔，则可确认“八月甲午”为周正八月（夏正六月）十七日。我们再来看薛文所引《传》文的杜注：

龙尾，尾星也，日月之会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见。

鹑，鹑火星也。贲贲，鸟星之体也。天策，傅说星。时近日，星微。焯焯，无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鹑火中，军事有成功也。

以星验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谓夏（按：夏正。晋用夏正）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会。

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过在策。

可见卜偃据以判断克虢时日的依据是童谣所说的天象。诚然，正如杜注所云：“童齔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若有冯（凭）者，其言或中或否。”然“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这是符合古人思想的。卜偃懂得天文（星相）——否则晋侯不会问他，故尽管童谣止言“丙之辰”（丙日的早晨），而每月有二或三个丙日，但“龙尾伏辰”、“鹑之贲贲，天策焯焯，火中成军”数语，已足以可供其得出时在“九月、十月之交”的“丙子旦”。“晨”，即太阳和月亮在一起（日月之会）——晦（小月廿九、大月三十日）朔（初一）交会时，也就是卜偃所云“九月、十月之交”的“交”。尾九星，跨大火、析木两次。据《汉书·律历志》载，尾宿计“十八度”，“大火，……终于尾九度”，“析木，初，尾十度”。日月之会于尾，为夏九月、十月（周十一月、十二月）之交，《吕览》、《礼·月令》所记只是没有这么精确。又，《吕览·孟冬纪》：“孟冬之月（按：夏十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礼·月令》同）即是月晨，七星位于中天。七星为二十八宿之一，在鹑火之次。又因月绕地一周仅廿九日半余，而地绕日一周须三百六十五日余，故在地之人观天象为“月行疾”。“是夜日月合朔于尾”，平旦之时，鹑火在中天，日在尾，月则已过尾而在策。据此，童谣即使没有“丙之晨”句，亦可知时在十月朔旦（初一早晨）。“丙”字仅可供判断在何年——并非凡十月朔皆丙日。（平均每十二年才有一个十月朔为丙日，因此这也没有实际意义。）由当时夏正六月十七日甲午，卜偃很快可算出当年夏十月朔正是丙子日（即下文所记周正“冬十二月丙子朔”），决不是误将“丙之晨”听作“丙子晨”，或“之、子古字通”的缘故。综上所述，薛文认“丙之晨”与“丙子旦”为互文，乃黯于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之故。以此否定王注，并断言《哀郢》“甲之鼜”即冯赋“甲子之朝”，诚不可信！

（下转第140页）

①见何幼琦《左氏“日南至”辨惑》，《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②参见王韬《春秋历学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11月第1版，第169页；〔日〕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华学艺社1933年7月版，沈璿中译本，第352页；朱文鑫《天文考古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94页；何幼琦《历术推步简述》，《江汉论坛》1981年第6期，第122页。

（三）关于法国大革命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有的同志提出，青年马克思对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怀有极大的兴趣，并明确指出，法国大革命完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是一次社会革命，而是一场政治革命，它有严重的局限性。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必须进行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不停顿的革命"的思想，这个思想是直接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还发现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这就是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由此看出从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在1844—1847年间就总结了1789年法国革命的经验，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道路。可见，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雏型在相当大程度上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对他的影响。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会上，有的同志同意这种看法。但多数同志认为，列宁已经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已包含在这三个来源之中，没有必要再提出第四个来源。但这些同志也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确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上接第109页）笔者愿为薛同志提供一例，证明"丙之晨"的丙即"丙子"。《汉书·律历志·世经》引《传》文"丙之晨"，正作"丙子之辰(晨)"。从这一童谣其余七句皆四字句来看，《左传》"丙之晨"句脱一"子"字，不无可能。但本文前已说明，卜偃预言的依据是童谣所说的一系列天象。他为什么不说克虢在下月廿九日或当年夏正十二月初二这两个丙子日平旦呢？而根据日月之会于尾、旦鹑火中等来判断，一"丙"字足矣！而且《律历志》引文乃"丙子之辰（晨）"，非"丙子晨"（冯赋同此）。王力先生主编之《古代汉语》如以"丙之晨"为例，责之以"似欠斟酌"犹可，其以"甲之鼋"为例，又何欠斟酌之有？

《哀郢》篇名，自王船山《通释》谓义取楚顷襄王廿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破郢而"楚之迁陈"，三百多年来，固不乏附和者，然怀疑者仍不绝。笔者近几年正潜心于为屈赋编年，每读是篇，常抱怨屈子何不如《离骚》之"庚寅"，明言之"甲某鼋吾以行"，而要留此哑谜于千古！不然，据该诗"方仲春（按：夏正二月。楚用夏正）而东迁"句，只须以历推算之，即可知公元前278年夏正二月有无此"甲某"日。有，王船山此说可得一有力佐证；反之，顿失立锥之地。薛同志对此重大意义似不甚关注，然余拜读薛文后，即以儒略积日推算，得：公元前278年，周正正月甲申朔，庚子（正月十七日）冬至；① 夏正正月癸未朔，二月十二或十三日甲子（初二或初三日甲寅、廿二或廿三日甲戌）。遗憾的是，诚如上述，"甲之鼋"非"甲子朝"！然薛同志及其他专家、学者，或另有材料可证"甲之鼋"即"甲子朝"（或"甲寅朝"、"甲戌朝"、……）。故不揣浅陋，草成此文，以期引玉也。

①如推算结果是年冬至非庚子日而又不在周正正月，必为前置闰而有一月之差。例如：冬至日庚午，则是年周正正月当为癸丑朔，正月十八日庚午（因为冬至必定在周正正月内）；夏正正月壬子朔，正月十三日甲子，二月无甲子日。结论恰恰相反，故不能不有所交代。至于冬至日干支，可先由儒略积日推得。兹不赘。